

汉魏学术思潮与建安文学的繁荣

李 中 华

汉魏之际,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,是一个大转折时期。在此之前,它经历了以尊奉“六经”为标志的汉代经学;在它之后,开始了以崇尚“三玄”为特征的魏晋玄学。建安时代,正是这一学术思潮转折的枢纽与关键。学术思潮的转移对于一代文人的心理构成、价值观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。建安文人呼吸着时代的学术空气,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心理,从而影响着文学的内在精神及艺术风貌,促成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与发展。

一、汉魏学术思潮转变之大势

汉代的学术思潮,自从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以后,进入了经学极盛的时代。当时“上无异教,下无异学”,皇帝诏书、群臣奏议,莫不援引经义作为依据。连下层官员也都能推明经义,移易风化,号为“以经术饰吏事”^①。汉宣帝甘露三年,朝廷召集群儒,论定五经,皇帝亲临裁决,史称“石渠阁奏议”。汉章帝建初四年,朝廷又大会群臣、诸生于白虎观,考详五经同异,著为《白虎通义》。汉灵帝熹平四年,又诏诸儒正定五经,刊于石碑,立在太学门外。这些旷世盛典,使得经学的势力笼罩全社会。

然而好景不长,经学极盛的局面在汉末大乱中迅速地崩溃了。探究经学衰落的原因,可以指出以下三条:第一,独尊儒术所造成的经学繁盛本是借助封建政治、尤其是皇权的提倡而出现的,它必然伴随封建政治的腐败、皇权的衰微而趋于没落。正如班固所说:汉武帝立五经博士,劝以官禄,尔后传业者愈盛,支叶繁滋,“盖禄利之路然也”^②。汉末宦官、外戚当权,朝政腐朽,经学被视为爵禄名利之途。学术文化成为封建皇权的附庸,学人失去了独立的品格与创造精神,这种学术的没落便是必然的。第二,汉代儒术不同于孔孟的原始儒学,它与阴阳谶纬之说相揉和,带有宗教的性质。孔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,而汉人解经,多涉怪异。丰富、活泼的儒家文化被歪曲,经生专事章句训诂,严守家法,成为“守文之儒”。被定为一尊之后,它又失去与其它文化思想互相竞争、自我调节、发展完善的学术环境,因而停滞、僵化了。第三,汉末党锢之祸,“志士仁人,多填牢户。文人学士,亦捍文网”^③。大批优秀的儒家知识分子被监禁、杀戮或屈死狱中,更多的知识分子遭到长达数十年的禁锢,成了推动学术思想剧变的现实契因。

概括起来,从内部看,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信的伦理原则和重视人道的积极精神被阉割,褪化为一种消磨、腐蚀文人心力的负累。解说一经,可以多至百余万言,“幼童而守一经,白首而后能言”,学术文化成了人类精神的重负。从外部看,东汉王室的崩溃,使经学失去了依托。汉末学术思潮之不能不变,其原因即在于此。

从东汉王充、王符、仲长统等人的论述中,已经可以感到学术思想转移的迹象。王充治

学“始若诡异，终有理实”，与一般守文之儒全然不同。他认为“人不能以行感天，天亦不随行而应人”。他说：“夫天道自然也，无为。如谴告人，是有为，非自然也。黄老之家论说天道，得其实矣。”^⑤王符则说：“鬼神与人殊气异务，非有事故，何奈于我？”^⑥仲长统性格倜傥，每当谈及古今时俗，就发愤叹息。他的言论更为直截大胆，说：“知天道而无人略者，是巫医卜祝之伍、下愚不齿之民也。信天道而背人事者，是昏乱迷惑之主、覆国亡家之臣也。”^⑦这些，向汉儒的“天人感应说”提出了挑战。

这种转变中的学术思想，初时犹如涓涓细流，随着汉末大乱而泛滥为时代的主潮。思想界挣脱了经学的束缚，而呈现多种学术文化并存、互相融合的局面。

儒学衰落了，但它的影响依然存在。一方面，对于封建政治文化的批判使人们将朝廷视为污秽之地。另一方面，儒家崇尚气节的人格精神却因党锢之祸的激厉而被发扬光大。史载李膺被拷死狱中，门生故吏遭禁锢，侍御史景毅上书朝廷，陈明与李膺的关系，自表免归。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为是西州豪杰，以不得列名党人为耻，于是上表说自己曾荐张奂，是附从党人；太学生张凤等又曾为自己赴阙上书是为党人所附，所以应连坐受罚。党锢之祸中遭受迫害的张俭被朝廷追捕时，人们纷纷冒杀身破家之祸收留、保护。这些感人的事例，都表现着儒家崇尚气节、舍生取义的精神。同时，道家的兴起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倾向。道学本有排遣郁闷、调节精神的妙用，其超奇的艺术想象力尤为文人所喜爱。由于时局维艰及儒家的没落，道家思想便弥漫于士人之间，表现为对生命的关注及神仙的向往。政治及军事斗争的需要，又使强调综核名实、赏罚必信的刑名之学应运而起。这里，各种学术思想的并存不是简单地互相排斥，而是互相制约又互为补充，成为一种新的综合体。

二、建安文人的文化心态

建安文人感受着同样的时代学术思潮，在文化心理上也呈现出若干共同或相通的特征。主要表现为三点，即开放的心态、建功立业的思想以及蕴涵着艺术情调的人生态度。

在学术思想上，建安文人采取了一种比较宽松的、兼容并包的态度。如前所述，儒学中迂腐繁琐、不切世务的部分被抛弃，而重人格、尚气节的儒家精神得到了继承与发扬。试以曹操为例。曹操年轻时曾上书为在党锢之祸中遇害的窦武、陈蕃鸣冤，言辞直切。建安八年，曹操又颁布《修学令》曰：“丧乱已来，十有五年，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，吾甚伤之。”他因此要求各郡国“修文学”、各县“置校官”，以使“先王之道不废，而有以益于天下”。在诗《善哉行》中，曹操歌颂古公亶父的“积德垂仁”、太伯仲雍的“王德之仁”，晏子平仲的“积德兼仁”，所赞美的人物及其语言都是儒家的。在《对酒》中，曹操描绘了自己的政治及社会理想：“王者贤且明，宰相股肱皆忠良。咸礼让，民无所争讼。三年耕有九年储，仓谷满盈。班白不负载”，“爵公侯伯子男，咸爱其民，以黜陟幽明，子养有若父与兄。犯礼法，轻重随其刑。路无拾遗之私，囹圄空虚，冬节不断。”诗中展现的，不就是一幅儒家的太平盛世图吗？道家思想对于曹操的影响，也是很明显的。他曾在诗中想象自己“驾六龙、乘风而行，行四海外”，幻想与赤松子、王子乔、西王母诸仙人玉女交往翱翔，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。曹操还喜好道家养性之法，懂得各类方药，招引各地方术之士，无不毕至^⑧。曹操还受到墨家的影响。崇尚节俭、反对奢华，主张“兼爱尚同”，便都与墨子的主义相吻合^⑨。他又特好兵法，曾注孙武子十三篇，作兵书十余万言^⑩。至于尚法术，好刑名，更是曹操思想行事的一个重要特征。晋傅玄上武帝疏曰：“近者魏武好法术，而天下贵刑名。”又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曰：“魏之初霸，术兼名法，”便都是就此而言。

这种情况在曹丕、曹植身上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。曹丕称帝的第二年，即下诏颂美孔子“屈己以存道，贬身以救世”，是“命世之大贤，亿载之师表”。在诗中亦说：“得人则安，失人则危”，“明德通灵，降福自天”，可见儒家的影响。曹丕又有《折杨柳行》叙游仙之事。曹植除了儒道之外，还可能受到佛教的影响。

这便形成了一种开放、综合的心态。开放，即不排斥任何学术文化的合理因素、创造精神；综合，即兼容并包，不将任何思想定为一尊，而让它们互相调节、臻于完善。在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文人那里，各种思想调和一体、各得其所：立身济世上，有儒家的道德人格；调节身心上，有道家的艺术精神；治国御军上，有综核名实、赏罚必信的法术；还有其它学术思想以为补充。

其次，建安文人多有建功立业的理想。汉末名士以天下事为己任，如陈蕃“登车揽辔，有澄清天下之志”。然而这种雄心却因封建政治严酷的打击而无法施展。一直到黄巾起义，汉廷被迫取消禁锢，积极用世之心才在士人中再度兴起。曹操年轻时便表现出非凡的志气与才干。据《后汉书·党锢列传》记载：名士首领李膺之子李瓚位至东平相，他在临死前叹道：“天下英雄无过曹操。必归曹氏！”另一个名士何颙初见曹操时，就说：“汉家将亡，安天下者必此人。”可知在当时，曹操已经被认为是汉末名士事业的继承者。“不戚年往，忧世不治”的精神，贯穿了曹操的整个一生。曹丕生于动乱之际，长在兵马戎旅之间，自幼便熟习弓马骑射，又纵览经史百家之言，当他被立为太子时，竟高兴地抱住丞相长史辛毗的颈项，问：“辛君知我喜不？”^⑫他虽然胸襟气度小于乃父，却常以古代的贤王明君自期。曹植的理想是“戮力上国，流惠下民，建永世之业，流金石之功”，而不屑于仅仅“以翰墨为勋绩，辞赋为君子”^⑬。七子冠冕的王粲，在《从军诗》中有“不能效沮溺，相随把锄犁”的自白，而陈琳“建功不及时，钟鼎何所铭”的诗句，则将这种壮怀吐露得更为明白直切。

其三，是通脱活泼、富于艺术情味的人生态度。

当经学独盛的时代，不仅学术的发展受到限制，文章辞赋成了经学的附庸，艺术尤被视为小道。经学的衰落，使文人能以轻松的态度对待人生，精神生活因之充实，而较富于艺术的情味。曹操“雅好文辞篇咏，虽在军旅，手不释卷”^⑭，“御军三十余年，手不舍书，昼则讲武策，夜则思经传。登高必赋，及造新诗，被之管弦，皆成乐章”^⑮。他善音乐，才能技艺可与桓谭、蔡邕相比。又善围棋。他的书法笔力雄贍，《唐人书品》称“曹操书如金花钿落，遍地玲珑，荆玉分辉，瑶岩生灿”^⑯。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固然取决于曹操个人的气识才具，亦与时代风尚相关联。

有关曹丕、曹植的两则轶事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文人通脱、活泼的生活风貌。一则见之于《世说新语·伤逝》：

王仲宣好驴鸣。既葬，文帝临其丧，顾语同游曰：“王好驴鸣，可各作一声以送之。”赴客皆一作驴鸣。

另一则见于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裴注引《魏略》：

（曹）植初得（邯郸）淳，甚喜。延入坐，不先与谈。时天暑热，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，傅粉。遂科头拍袒，胡舞五椎锻，跳丸、击剑，诵俳优小说数千言。讫，谓淳曰：“邯郸生，何如耶？”于是乃更衣，整仪容，与淳评说混无造化之端，品物区别之意。然后论羲皇以来，贤圣、名臣、烈士优劣之差，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，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。……淳归，对其所知叹植之才，谓之天人。

这些举动抒情别致而脱略礼法，精神豪爽而风度翩翩，散发着新的人性及人格解放的气息。它们发生在曹丕、曹植身上，颇能发人深思，耐人寻味。

三、建安文学的新风尚

新的学术思潮的变化造就了建安文人的新心态，使他们在感知世界、认识人生、从事创作时表现出与汉代文士明显的区别。刘师培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的缘由及风貌，概括为四条：“两汉之世，户习七经，虽及子家，必缘经术。魏武治国，颇杂刑名。文体因之，渐趋清峻，”这是第一条；“建武（东汉光武帝年号）以还，士民秉礼。迨及建安，渐尚通脱。脱则侈陈哀乐，通则渐藻玄思，”这是第二条；“献帝之初，诸方棋峙。乘时之士，颇慕纵横。骋词之风，肇端于此，”这是第三条；“汉之灵帝，颇好俳词。下习其风，益尚华靡，”这是第四条^①。四条之中，前三条均与汉魏学术思潮有关。

这就造成了新的文学风尚。首先，建安文学对于时代的反映更直接、真切，文学的现实性增强了。汉末社会动荡，人民痛苦已极，现实的悲剧不断地刺激着文士的心目。在他们的笔下便记录了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：

铠甲生虱虱，万姓以死亡。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。

——曹操《蒿里行》

洛阳何寂寞，宫室尽烧焚。垣墙皆顿擗，荆棘上参天。……中野何萧条，千里无人烟。

——曹植《送应氏》

出门无所见，白骨蔽平原。路有饥妇人，抱子弃草间。顾闻号泣声，挥涕独不还。

未知身死处，何能两相完！——王粲《七哀诗》

卓众来东下，金甲耀日光。……斩歼无子遗，尸骸相撑拒。马边悬男头，

马后载妇女。长驱西入关，迢路险且阻。——蔡琰《悲愤诗》

至此，文学才冲破汉代经学的牢笼，走出宫廷，走向了社会。文学由润色宏业的工具转变为描写现实、抒发情志的手段，文人由倡优弄臣转变为时代的歌手，从而在传统的文学精神中注入了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。

同时，文学的抒情性也加强了。前人论建安文学，多言气质，如沈约说曹植、王粲“以气质为体”，刘勰论建安文学“慷慨以任气”，李善说“气质驰建安之体”。这里的“气”或“气质”，是指文人的主观精神。兵燹频仍、祸乱相结使建安士人充满了对于现实的忧患，发而为要求变更现实、扫平世乱的昂扬志气。正如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所说：“自献帝播迁，文学蓬转，建安之末，区宇方辑……观其时文，雅好慷慨，良由世积乱离，并志深而笔长，故梗概而多气也。”

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建安文人主观精神的主流，那就是“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”。因时代动乱而忧思绵长，进而激发出慷慨的志意，所以建安诗文，多浸润悲壮之气。如以下的诗句：

瞻彼洛城郭，微子为哀伤。（曹操《薤露行》）	烈士多悲心，小人偷自闲。（曹植《杂诗》）
悲彼《东山》诗，悠悠使我哀。（曹操《苦寒行》）	哀彼《东山》人，喟然感鹳鸣。（王粲《从军诗》）
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。（曹操《短歌行》）	悟彼《下泉》人，喟然伤心肝。（王粲《七哀诗》）
君子多苦心，所愁不但一。（曹丕《善哉行》）	

残酷的社会现实在文人心中引出深重的忧伤，使他们时而产生人生虚幻之感。然而更重要的，是激起他们心中平世乱、济苍生、立功业的壮志：

不戚年往，忧世不治。（曹操《秋胡行》）

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（曹操《步出厦门行》）

在昔周武，爰暨公旦，载主南征，救民涂炭。……我独何人，能不靖乱。（曹丕《黎阳行》）

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。（曹植《白马篇》）

虽无铅刀用，庶及奋薄身！（王粲《从军诗》）

庶几及君在，立德垂功名！（陈琳《游览诗》）

这些诗句给人的感觉，不是气象衰飒、无可奈何的哀鸣，而是气宇沉雄的壮歌。它们是建安时代精神的体现。

对人情的体味与模拟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。曹操在《却东西门行》中写战士的生活飘荡不定如同转蓬，“长与故根绝，万岁不相当”、“冉冉老将至，何时反故乡”。在《谣俗词》中模拟一个穷汉无力帮助朋友的心情。曹丕《燕歌行》拟思妇之情，《清河作》拟挽船士新婚别妻的心情。王粲《七哀诗》中拟饥妇弃子的语气及心情。这些，可能是受到汉人解说《诗经》的启发（汉人解《周南·卷耳》诸篇，多拟辞之说）。另一方面，也说明建安时代对于人情的重视增强了。

与建安士人开放、通脱的文化心态相一致，建安文学在艺术上呈现清新活泼的风姿。从语言上看，有两种倾向：一是尚华丽，二是贵实用。刘师培《论文杂记》谈汉魏文章之变约有四端：汉人文章大抵单行之语，建安则易以排偶，“即非有韵之文，亦用偶文之体”，此其一；汉文言辞简直，句法贵短，魏代由简趋繁，有时用二语合成一意，此其二；汉文风尚古朴，魏文则多益之以声色，饰之以藻绘，此其三；汉人文辞古奥，不易明了，建安文章语意易明，无俟解释，此其四。总的倾向是趋于骈偶华丽，而不同的文体表现不同。大体上说：书檄之文则“骋词以张势”，论说之文逐渐趋于“校练名理”，奏疏之文“质直而屏华”，诗赋之文“益事华靡，多慷慨之音”^⑩。文体不同，呈现的艺术风貌也不尽一致。

建安诗歌在语言上走着骈偶化的道路，同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内蕴的意象美。试将西汉韦孟的《讽谏诗》《在邹诗》、东汉傅毅的《迪志诗》与曹操的《短歌行》、《步出夏门行》稍作比较，便可感到它们不仅精神气质明显不同，诗歌意象的丰瘠腴枯亦判然有别。从总的方面看，解放了的文人灵魂对自然山水之美的感受大大地丰富了。道家思想的勃然兴起使得对于神仙境界的想象更完美、更具人情味了。《诗》《骚》中优美的情景描写带着新的意蕴回归了诗苑，从而造成了新的意象群体，使建安文学呈现群芳璀璨、美不胜收的局面。

总之，汉魏之际学术思潮的转折给了建安文学以影响，推动了文学风气的转变，促成了它的繁荣。当然这种影响是间接的、潜移默化的。对于不同的作者，其程度及表现方式互异。从艺术风貌看，曹操悲壮古直，曹丕清绮绵长，曹植辞采华茂，七子所善，亦各有偏长。这些还涉及到文学内部的、以及社会人生的诸多因素，学术思想的影响不过是综合因素之一端罢了。

注释：

①③ 皮锡瑞：《经学历史》。

② 《汉书·儒林传赞》。

④ 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

⑤ 《论衡·谴告》。

⑥ 《潜夫论·卜列》。

⑦ 见《群书治要》。

⑧⑩⑮ 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，裴松之注。

⑨ 参见曹操诗《度关山》。

⑪ 《三国志·文帝纪》。

⑫ 《三国志·辛毗传》，裴松之注。

⑬ 曹植：《与杨德祖书》。

⑭ 《典论·自叙》。

⑯ 转引自陈登原《国史旧闻》卷十七。

⑰⑱ 刘师培：《中古文学史讲义》。